

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的交叉和分野

——从《论犹太人问题》谈起

刘 妍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以《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蕴含的马克思对西方公民权的批判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在核心内容、基本属性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存在交叉和分野:公民权的实然与应然之异,政治人格和社会人格塑造的统一性与割裂性之别,爱国主义教育与国际视野培养的真实性与矛盾性之差。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相较,并不存在任何缺憾,反而具有公民教育所不具备的特性和优势。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论犹太人问题》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20)02-0170-07

思想政治教育因内在蕴含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多重维度,自产生之初就面临与公民教育、德育等学科的名实之争。以政治教育而论,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究竟谁具有合法性,一直存有争议。近些年,围绕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关系,学界有诸多探讨,学者多从内容、属性、目标来区分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用“包含”“补充”“替代”等说法来概括两者关系。一些学者还认为,当前我国学校教育存在公民教育缺位,以政治教育代替道德教育、公民教育等问题。这些争论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学科的独立性依然有待澄清和巩固。然而,学界对两者的基本属性、培养目标、内容方法等的探讨仍局限于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之“名”,只有分析属性和目标背后所蕴含的实质内容、形成原因、阶级属性,即认清两者之“实”,才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正名”。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作为其政治哲学的重要文章,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公民和公民权的实质。正如研究公民身份问题的美国学者基思·福克斯所言,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从一种不同的背景对公民身份问题进行强调,对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给予最有力的批判^[1](51)]。《论犹太人问题》对我们透析西方公民理论产生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揭示西方公民教育的理论本质和价值取向也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实”的层面厘清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的根本差别提供了研究基点。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存在交叉和分野,主要体现在核心内容、基本属性和价值取向这三个方面。

收稿日期:2019-12-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高校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改革”(16JJD710003)

作者简介:刘妍(1994-),女,浙江杭州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引用格式:刘妍.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的交叉和分野——从《论犹太人问题》谈起[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

一、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核心内容的交叉与分野

无论是古希腊时期对公民美德的强调,还是近代以来重视公民权利和公民身份,权利都是西方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从历史的维度看,深藏在资本主义国家公民权背后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个人享有人身、言论、信仰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是西方公民权的核心要义。然而,自由与平等并非永恒真理,而是历史的产物。现代的自由与平等是伴随着资产阶级而出现的概念,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要求资产阶级摆脱封建桎梏,消除贵族特权,确立权利平等^{[2](111)}。马克思分析道:“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资产阶级。”^{[2](11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交换,使其必须向封建贵族寻求自由平等、不受限制的权利,以便获得具有人身自由的工人并与之订立劳动契约。这种历史背景决定西方公民教育自产生之初就以赋予公民自由平等的权利为前提,以对抗封建等级制为目的。

(一)西方公民权的虚假性

西方公民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最大的责难莫过于强调西方教育充分尊重自由平等,指责社会主义国家企图通过思想控制来限制人们的自由。这种观点否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培养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是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极大歪曲,没有认清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未能从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区分两种教育对权利与自由要求的区别。

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所言的权利与自由存在实然与应然层面的本质差异。西方社会学家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论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三个方面梳理了英国公民权利的发展历史,并建构了西方公民身份的基础理论^{[3](10-11)}。如果说马歇尔揭示了资本主义国家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那么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则分析了这种权利背后的虚假性。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实质上仅完成了政治解放,政治解放的国家却分裂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过去,在封建社会并不存在这种分裂,人们生活于政治共同体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等级和特权关系,整个国家受到宗教势力的支配。政治解放后,资本主义国家赋予封建社会的臣民以公民身份,给予其一系列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并宣称公民平等自由地享受这些内容。可是,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在于只看到政治国家中人获得了公民权,却没有看到在市民社会领域中公民权和人权的虚假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是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依然存在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的差别。马克思以自由权为例具体分析,市民社会的自由是指“从事任何不损害他人权利的事情”^{[4](40)},因此,“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离的基础上”^{[4](41)}。这种狭隘的自由是只属于个人的权利,本质是保护私有财产。

马克思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所营造的自由平等权的幌子,在其日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揭示了只有解决私有财产权的问题才能真正带来社会的自由平等。现代平等观念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2](109)},并强调“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经济的领域中实行”^{[2](112)}。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权利只存在于抽象的国家范围,一旦进入社会、经济领域就消失不见了。以德国为例,过去,德国资产阶级公民概念根据私有财产的多少而定,无产阶级的状况不容许他们享有这种权利,因而这种名义和实际地位的矛盾使无产阶级成为空有其名的公民^{[5](14)}。反观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单向度的人其实就是这种分裂状态的当代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混乱和无序也根源于市民社会的利己性。

(二)真正的公民意识教育

以公民权为核心的西方公民教育本质上是公民身份教育。公民身份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公民享

有自由平等权的确认,身份总是与权利、义务相伴,由资产阶级所塑造的公民身份本身就迎合他们的利益诉求。正如马歇尔所言,公民权利是为那些能读会写的、理智的、有知识的人而设计的,而教育是公民自由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3](21)}。在德国,公民训练、公民教育概念是由资产阶级创造用来反抗封建式贵族的利器。18世纪至19世纪初叶,公民教育侧重公民权利,目的在于从半封建、半专制的政体中争取公民权利,后来,重点渐渐从权利方面转移到义务方面,要使中等以下阶级遵守公民对资产阶级政府应尽的义务^{[5](14)}。

公民身份是一国公民区别于别国的特征所在,具有排他性。这也体现了公民身份和公民教育的“私”性所在,即通过权利确立公民个人的主体性地位。公民权及其所蕴含的公民身份是区分不同国家公民教育的政治差别、阶级归属、核心价值观差异的重要表现,是各国公民教育的基础性内容,也是彰显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差异性的核心维度。公民权和公民身份内含公民资格,确认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国家通过公民权教育,使公民意识到自己身为一国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并自觉履行,因而关于公民权的教育也被称为公民意识教育。公民意识教育的核心是培养政治价值观,是使受教育者形成合格的政治素养和培育政治价值观的基础,公民意识教育及其所内含的公民权、公民身份教育本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之意。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公民权教育区别于西方公民教育的显著之处在于,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社会以共同富裕为根本追求,确认人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公民享有真实而具体的自由平等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塑造公民意识的重要渠道,也是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内容。与西方价值观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富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价值追求,以此为追求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提供基础。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公民教育以提高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公的自觉性为宗旨,主人翁地位是彰显我国公民权利和身份的显著标志。这就要求公民在享有自身权利的同时,维护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尊重他人的自由和权利^{[6](452)}。因此,责任意识教育是我国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内容。与西方公民教育相较,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公民权教育是一种积极获取自身作为国家主人身份的教育,而西方以权利为核心的公民意识教育隐含了一种消极的自由观和个体本位的权责观,其目的是使每一位公民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不干涉他人的财产和自由,最终是为了维护私有制。

综上所述,以公民权为核心的西方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核心内容上存在着实然权利与应然权利的分野,这种在公民身份、公民权利、公民义务上的不同性质决定了两者具有无法融合的异质性。

二、政治性与社会性:基本属性的交叉与分野

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本质上都是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和塑造公民良好品行的实践活动,根本目的的趋同决定了两者并无绝对差别,反映出二者的交叉与分野关系。从属性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兼具政治性与社会性。以政治性而论,思想政治教育毫不避讳自己是意识形态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一定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就是政治性。其实,西方公民教育本质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权的统治,但采用了一种以社会性和公共性教育为表象、以意识形态教育为内在的隐性方式。毋庸置疑,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公民教育都以维护政权为前提,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决定了政治属性的分野。以社会性而论,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教育培育的都是参与社会生活的人,是对公民进行社会化教育的过程。培育具有一定社会属性和公共属性的现代公民,增强个人对社会、民族、国家的认同和责任意识,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

教育的共同使命。这也反映出政治性与社会性本身具有融通性。一方面,社会性要在一定政治性要求之下才能成立。重视社会人格、忽视政治人格的后果是现代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很弱,体现为轻易放弃了自己身为国家主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其实,社会人格本身应该属于政治人格,西方公民教育也十分重视培养政治人格,公民教育对公民权利与义务的重视本身就是政治人格的形塑过程。另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政治性也是社会性的体现,“人们的政治关系同人们在其中相处的一切关系一样自然也是社会的、公共的关系。因此,凡是有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都是社会问题”^{[4](233)}。可见,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公民教育,都是政治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一)西方公民教育中政治人与社会人的割裂性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政治价值观念塑造,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依据和目标,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主要手段。这种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一直为某些西方人所蔑视和诟病,然而殊不知西方公民教育并不存在信仰教育缺位,其信仰教育一直与宗教和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马克思强调,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在于,即便国家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人还没有摆脱这种限制,这时人还不是自由人,依然受到宗教的奴役^{[4](28)}。西方公民教育中的宗教教育是一种消极意义的维护统治和培育忠诚,与政治诉求有着密切关联。此外,由于宗教本身的非科学性,这种价值观的培育无法达到一种深切的理想信仰的境界,还是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价值观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在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两者在社会属性上的不同特点则具有隐蔽性。公民教育的社会性强调培养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能力。社会公共领域是与国家相对立而存在的,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观点来看,社会公共生活主要属于市民社会。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批判市民社会将人分裂成为利己主义的原子化的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过着双重的生活,当他们处于政治共同体中时被视为一种社会存在物,当处于市民社会中时就是一种孤立的个人,人被视为谋利的工具^{[4](30)}。换言之,公民教育一方面培育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和能力,倡导人与人互帮互助;另一方面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追逐权力和金钱的竞争无处不在。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中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人,这即是现代资本主义公民教育宣称培养人的社会属性的虚假性和两歧性所在。西方公民教育非但不能培养真正的公民,还将造成公民的人格分裂,出现马克思所言的“公人与私人的矛盾”,这也是导致当前西方公民社会人们价值观混乱的重要原因。

(二)真正的政治人和社会人教育

何为真正的公民?马克思认为,只有当人的解放完成后,人才能真正回归人的本质,完成人的社会属性的复归,“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两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4](46)}。反观资本主义社会,“仅仅在政治国家层面赋予个人以公民地位和公民权利是不够的,现代人只有从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的统治中走出来,摆脱私人、利己之人的本性,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7]。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保障的,人民具有在物质生活领域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政治领域成为真正公民的现实保障。这为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西方公民教育在公民社会属性的培养方面具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那种所谓以公民教育的社会性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的观点本身就缺乏理论基础。我国提倡公民教育,究其本质,倡导的是一种公共性教育和公德教育。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既要认识到个人公民权利的主体性和不可侵犯性,也要认识到自己身处公共生活中,正所谓“公民之‘公’”,表明他不同于个人主体,还

必须具有融入共同体的公共性”^[8]。当前,一部分呼吁在我国学校生活中注重公民教育的学者大多指向培育公共精神,认为当代国人面临公共道德冷漠、公共责任意识缺失等问题,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当前学校教育缺失公共精神教育,我们没有以公民教育为“名”的教育,不等于没有以公共精神为“实”的教育。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历来重视公共精神,教育内容中无不包含着公德和公德意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同向而行,服务国家现代化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适应国人当代公共生活的大德,是当代社会公共精神的集中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是一种公共精神教育,其核心和本质都内含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在公共精神教育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近些年,学者的视线过多投向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关怀、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应更大程度满足个人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公共精神和公德意识方面确有不足。随着学科建设逐渐成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有公共性视野,培养受教育者既关注自身生命,又关注公共生活。

由此观之,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兼具政治性和社会性,以公民教育的社会性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的观点缺乏理论基础,且西方公民教育所培养的社会公民就本质而言具有割裂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并不缺乏社会性和公共性视野,应更加重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的社会公德教育。

三、国家与共同体:价值取向的交叉与分野

从古希腊开始,公民教育就是为城邦或国家培养合格公民。马克思分析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后指出,政治解放使国家不再通过宗教这个中介获得合法性,直接通过国家这个中介,“国家成为新的寄托,它代替了神,被认为是可以让人获得自由的神圣力量”^[7]。公民教育的本质是国家认同教育,是认同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历史上,西方公民教育有培养忠顺心理的传统。在德国,学校是养成国家意识的主要机构^{[5](144)},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爱国训练和参与国事的经验训练^{[5](162)}。英国学校的典礼仪式教育、团体活动能够培养恭顺心理,也是培养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意识^{[9](222)}。美国18世纪的公民美德教育同样强调一致意见和恭顺,公民没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忠于社群是美德^{[10](21)}。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教育,爱国主义的内容都是重中之重,并且两者都重视广泛利用各种手段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在苏俄的公民训练中,教育局的职能不单限于学校,博物馆、陈列馆、剧院、电影院、纪念馆、纪念日都归其管理^{[11](95)}。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形成了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依托,重视家庭和社会作用的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三全育人”模式。与强调忠顺心理的西方公民教育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爱国主义教育与理想信念教育的统一,即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统一。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内含世界历史之维,与产生于西方的“世界公民”理念具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展现出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在价值取向上有着突破国家限制的共同体视域,但与西方国家的“世界公民”思想又有着本质区别。

(一)西方“世界公民”教育的矛盾性

近些年,西方公民教育提出了培养“世界公民”的口号。“世界公民”的理念萌生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历经卢梭、康德、费希特等人的发展,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不断增多的当代社会又被重新重视。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世界公民”教育强调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的“世界公民”,实践中却渗透着价值理念和课程内容的普世化、同质化要求。这种“世界公民”理念之所以隐藏,是因为其意在淡化民族意识,削弱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教育。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在各民族、各国家相互依存、普遍交往的基础上,人作为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逐渐彰显^{[4](538)}。这种世界历史与人的解放程度和共产主义的实现程度一致。马克思还认为,资产阶级是世界历史的开创者,但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互竞争使得个人并不具备现实关系的丰富性和个性化,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4](542)},真正的世界历史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不难发现,西方公民教育的爱国主义外衣之下是忠诚教育,培养具有普世价值的“世界公民”的说辞经不起推敲,由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世界公民”教育并不具备现实土壤,且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实际相矛盾。

(二)真正的共同体价值内涵

实质上,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世界公民”的教育理念。《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最后谈到了他对真正的公民和公民权的设想: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获得真正的权利,生活在共同体中,把自己当作社会的人,“公共事务本身反而成了每个个体的普遍事务,政治职能成了他的普遍职能”^{[4](45)}。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思想政治素质培育是要培养受教育者在共同体中生存和发展,一定意义上,它具有超越国家限制、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要求,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怀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各国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既关心各国的切身利益,又重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具有国际视野,又没有与各国爱国主义教育相违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界在于“回到公共生活的视界”,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本质上也是一种“公共人”,因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培养以公共价值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公共人”的公共性实践^[12]。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着眼未来、跨越国界,重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性内涵具有比公民教育的“公共人”和“世界公民”更为确定和科学的内容。

从狭义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即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和共产主义信仰武装头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批判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信仰具有超越国界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不能只在一个国家实现,必须所有国家共同实现才具备长久的可能性,但共产主义实现需要一个过程。因此,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是立足于国家层面的爱国主义教育,但不放弃共产主义共同理想信念教育。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在层次上有所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因重视理想信念而成为更高层次的教育。我们认为,这种所谓教育层次的差别是由于最终价值指向不同所产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为更高追求,依托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培育,但并不放弃公民教育的基本要求。不难看出,在培养国家的公民还是未来共同体的公民这一问题上,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存在价值立意的交叉与分野,这一区别也决定了两者的发展趋势。

总之,公民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视野的双重维度,但公民教育建立在对国家忠诚基础上的“世界公民”设想缺乏现实根基,思想政治教育以共产主义为理想寄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现实指南的共同体意识培育更具真实性和可行性。

四、结论

交叉和分野映射着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教育作为意识形态教育,都以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教育为基础,离不开本国的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传统,依托各自的社会进程和发展实践。从培养目标、价值追求等方面看,公民教育并不存在超越思想政治教育之处,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公民教育所涵盖的全部内容。

在具体性质上,两者存在差异,如公民权的实然与应然之异,政治人格和社会人格塑造的统一性与割裂性之别,爱国主义教育与国际视野培养的真实性与矛盾性之差。因而说,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公民教育所不具备的内容。这突出体现为思想维度的不同,公民教育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宗教凝聚国家认同,思想政治教育以科学的思想引领政治教育,赋予受教育者正确的思想、观点、方法,注重启发民智。思想政治教育从未把公民教育排除在外,公民教育本身就在思想政治教育之内。任何国家的公民教育都应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相契合。

质言之,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教育是在不同意识形态之下国家对公民的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不会被公民教育所取代,应将公民教育整合到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吸纳公民教育。

参考文献

- [1][美]基思·福克斯. 公民身份[M]. 郭忠华,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
- [2][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英]T. H. 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 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M]. 郭忠华,刘训练,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4][德]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美]可索克. 德国公民教育[M]. 金澍荣,黄觉民,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6]彭真. 彭真文选(1941~1990)[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陈培永,赵金英. 重思马克思的“公民”和“公民权”概念[J].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5).
- [8]冯建军. 多元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 [9][美]高士. 英国公民教育[M]. 黄嘉德,译.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
- [10][美]迈克尔·舒德森. 好公民——美国公共生活史[M]. 郑一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11][美]哈朴. 苏俄公民训练[M]. 郑群彦,译. 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4.
- [12]戴锐. 思想政治教育的公共化转型[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1).

【责任编辑 李小凤】

The Intersection and Division betwee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ivic Education:from the *On the Jewish Question*

LIU Yan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arx's critique of western citizenship contained in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have overlaps and divergences in three aspects, core content, basic attributes and value orienta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ctual and expected of citizenship,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unity and fragmentation of politica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ersonalit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uthenticity and contradiction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vision. Compared with civic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oes not have any regrets, but ha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that civic education does not have.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ivic Education; *On the Jewish Question*